

人工智能影响下生育意愿重塑 与生育支持优化*

王金营 王小涵**

提要:在以人工智能为引领的第五次科技革命浪潮下,经济形态(生产力水平)、社会结构、公共服务体系以及个体价值观念正经历着深层次的变革。科技的进步促使就业结构、公共服务模式和社会文化观念发生转变,这些转变深刻地影响并重塑着人们的家庭观念、生育观念以及生育决策。新人口转变过程中,低生育率困局亟待破解,而这需要生育支持服务体系适应新科技发展带来的变化。基于此,本文聚焦人工智能引发的社会结构、价值观念和社会服务等方面的变化,以第二次人口转变理论为基础,探究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对适龄婚育人群生育意愿和行为选择的影响,深入剖析其在塑造家庭生育意愿时所产生的积极和抑制双重效应。在此研究基础上,本文提出通过技术与政策的协同联动,优化人工智能时代的生育支持体系,为提升生育意愿、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启示。

关键词:人工智能 生育意愿重塑 生育支持体系

一、引言

当前,我国面临着生育率下降引发的少子化、老龄化问题,这给社会经济

* 本文系研究阐释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增强综合实力的中国人口长期发展战略研究”(项目批准号:21ZDA108)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 王金营,河北大学经济学院。王小涵,河北大学经济学院。

发展带来了巨大挑战。为防止人口结构性失衡以及劳动力供给不足,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和高质量发展,2021年党中央发布了《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决定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即“放开三孩”政策。然而,事实表明,仅靠放开限制性生育政策并不能必然提高生育率(鲁全,2021)。因此,通过全面完善生育支持和服务体系,以有效提升家庭生育意愿和生育率,已成为当务之急。已有研究显示,尽管家庭的生育意愿与实际生育行为之间存在一定差距,但二者存在必然的逻辑关系(Demeny,2003),积极的生育意愿仍是生育行为发生的重要驱动力。所以,如何提升育龄人群的生育意愿,成为缓解生育率下降、优化人口结构的关键所在。

生育意愿作为影响社会生育率的关键因素,受到多种现实情况的影响。这不仅包括家庭面临的就业与收入状况,还涉及社会公共服务供给以及社会生育文化氛围营造等一系列社会性问题。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在社会运行中的介入程度不断加深,人们所处的社会环境、公共服务和社会文化价值都发生了深刻变革。在第二次人口转变理论下,人口再生产类型表现为“低生育、低死亡、低自然增长”的现代模式后,以婚姻形式变化、婚育和家庭观念趋向淡化等为代表的社会变化,成为生育率持续走低的直接原因。这引发了我们的进一步思考:人工智能是否会通过重塑社会环境推动人口转变的发展,进而重构个体或家庭的生育意愿?哪些因素会促进生育意愿?哪些因素会抑制生育意愿?另一方面,从生育支持政策体系的角度看,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引发的社会变化,使现有支持体系在某些方面出现了有效性不足的问题。因此,如何合理优化生育支持体系,也成为人工智能社会背景下提升生育意愿的重要内容。重新审视人工智能社会背景下生育意愿的重塑机制与生育支持体系的优化路径,提升家庭生育意愿,逐渐成为回应新时代人口结构挑战、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和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方向。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以“人工智能对生育意愿的重塑”为研究切入点,基于第二次人口转变理论,深入剖析人工智能技术对就业结构变化、生育观念塑造、社会服务供给等方面的重构效应。通过分析人工智能对上述方面的影响,探讨其对适龄人群生育意愿的改变,并在此背景下研究如何优化我国生

育支持政策体系,为纾解低生育困境、推动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提供理论依据与优化建议。

二、人工智能影响下的生育意愿重塑

(一)第二次人口转变下人工智能对生育意愿的影响机制

相较于传统的人口转变(第一次人口转变),第二次人口转变呈现出诸多特征。人均初婚、初孕年龄不断提高,单身率、同居率与离婚率持续上升,高胎次生育明显减少,家庭中心转移以及婚育关系发生变化。这些变化导致当下生育率持续走低,且长期低于人口更替水平(於嘉、谢宇,2019)。生育率的降低进而塑造了第二次人口转变下新的人口发展趋势,即“低生育率下的降低、低死亡率下的上升、自然增长率转负”。随着“三孩政策”的放开,如何提振当前低迷的生育率、激发适龄人群的生育意愿,以应对人口转变带来的人口结构变化,成为当前学术研究的关注重点。

综合现有研究可知,生育意愿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可分为内生与外生两个层级,涉及个体现实环境、婚育文化观念与宏观社会服务等。在内生层级中,微观个体现实因素是重要方面。当代青年群体在生育养育过程中面临经济、照料负担与家庭—工作冲突等多重压力(石智雷、杨云彦,2014)。对此,有学者从“成本—效用”角度分析,认为随着社会发展,家庭对子女的预期收益降低,而生育带来的直接经济成本与机会成本不断上升,使得家庭对待生育行为更加理性(赵伟锋等,2017)。生育文化观念也是内生性影响因素之一。部分研究指出,随着受教育水平提高、经济与个体意识增强,社会中个体主义倾向上升,当代中国婚育观念从家族主义转向现实主义,婚育目的由“传宗接代”转变为“为爱成婚”,婚育分离使年轻家庭不再将生育视为家庭的首要任务(石人炳、王昕迪,2025)。在外生层级中,即宏观社会服务领域,主要聚焦于医疗与托育等服务的发展水平对生育意愿的影响。有学者以托育服务为视角,认为公共托育服务的普及通过闲暇释放效应,可有效降低家庭的育儿时间冲突,进而提升家庭的生育意愿(赵文政、张立国,2025)。同时,医

疗服务发展领域的相关研究也表明,高质量的医疗技术资源能够通过提供及时有效的医疗服务,降低孕龄妇女的生育风险,从而提高其生育意愿(周国红等,2021)。

由此可见,影响生育意愿的因素贯穿于从婚育决策到儿童养育等生命周期的重要阶段,涉及个体、社会与文化等多元因素的综合影响。在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信息技术快速发展,引发社会生产模式与大众生活方式等全面社会变革的大背景下,人工智能技术将如何对个体环境、价值观念与服务模式进行系统性重构,进而对生育意愿产生深远影响,是本部分研究的重点。本节将参照生育意愿的多元影响结构,厘清人工智能对生育意愿影响的内在路径(图1),为优化生育支持政策、完善生育服务体系、提升生育意愿水平提供重要理论基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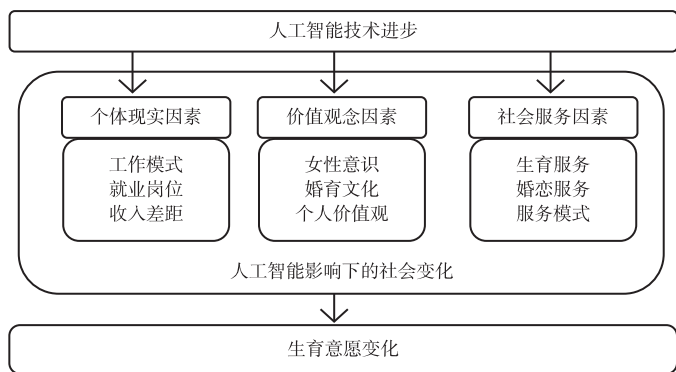


图1 人工智能影响下的生育意愿变化机制

(二)人工智能对生育意愿的促进作用分析

1. 人工智能背景下的工作模式变革

人工智能技术引发的就业模式变革,为劳动者在婚育期的“工作—家庭”平衡问题提供了全新的解决路径。它减轻了照顾子女的成本与负担,对第二次人口转变下持续低迷的生育率产生了积极的缓冲效应。在人工智能技术推动下,智能办公系统、远程协同平台和高效人机交互技术广泛应用,促使传统办公模式逐步向数字化模式转型。这种平台化工作机制,显著弱化了工作

对物理空间与时间结构的刚性需求,使职场参与方式更具灵活性与自主性(刘翠花、丁述磊,2025)。对正处于备孕、生育或育儿阶段的劳动者而言,人工智能工作平台能让他们在不中断职业轨迹的前提下,继续从事劳动创造与社会参与,有效缓解因生育带来的职业中断焦虑和长期职业发展的不确定性。智能化平台在优化工作效率的同时,也为家庭责任分担提供了更大的弹性空间。劳动者借助智能排班、任务协同等数字化工具,能实现更程度的时间自主性和灵活的工作安排,在满足企业绩效要求的同时,保有一定的家庭照护能力,有利于育龄劳动者实现职场角色与家庭角色的双重平衡。

通过劳动制度设计与智能技术支撑的有效联动,人工智能创造的灵活工作环境,使女性劳动者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生育惩罚”困境,推动了社会对其劳动形象的重新认知。女性更能够被视为以更灵活、更高效的方式兼顾家庭与职业的复合型劳动者。人工智能降低女性生育成本,对于育龄女性缓解社会压力、增强生育意愿具有重要意义。

2. 人工智能背景下的婚育文化构建

引发第二次人口转变的重要因素在于婚育观念的变化。而人工智能技术在婚育文化传播过程中的广泛应用,为塑造婚育友好文化环境、提升生育意愿带来了积极作用。人工智能算法加成下的婚育观念传播,可依托语义理解、情感识别和反馈分析等技术,实时捕捉用户在信息接收过程中的情绪波动与认知反应,从而调整传播内容与风格。这种对话式传播机制强化了平台与用户之间的信任关系,提高了用户对婚育信息的接受度(支振锋,2023),实现了人工智能背景下婚育文化传播在内容形式与信息分发机制上的同步革新。相较于传统模式,人工智能可通过大数据收集、用户画像与行为分析等手段,精准识别受众的兴趣偏好与心理预设,实现定制化和个性化的内容推送。这种信息传递方式的创新,显著提升了婚育文化的适应性与传播效率,为实现文化引导与社会治理的精准对接提供了坚实的技术保障。此外,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技术(AIGC)的应用,有效拓展了婚育文化内容的表达方式。例如,生育宣传内容可依据用户年龄、职业、兴趣、婚育阶段等特征进行高度定制,提升大众对生育宣传的接受程度。针对处于初次婚育决策阶段的青年群体,可生成具备生活情境感的短视频、动漫剧、互动访谈等内容,增强情感共

鸣与价值认同;对于已婚育龄人群,则可推送育儿经验、职场平衡、心理支持等方面的实用知识,实现内容供给与现实需求的深度匹配。传播机制与内容生产方式的全面创新,不仅提高了婚育信息的精准性,更通过内容与情感的联动,推动了婚育文化认同的形成。

3. 人工智能对社会生育服务的提升

伴随着国家公共服务智能化、全面化战略的深入推进,人工智能逐步嵌入生育服务全过程的多个关键环节,为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环境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生育过程中,适龄家庭生育意愿下降是影响整体生育水平的重要因素,而这一现象背后存在着多种原因。一方面,社会生活节奏加快、环境污染加剧,导致青年群体生育能力下降,这已逐渐成为影响我国当前整体生育水平的重要因素(穆光宗、林进龙,2021)。人工智能技术在辅助生殖领域的广泛应用,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积极路径。它通过机器学习和深度算法对大量临床数据进行分析,评估和预测男性生育力,为适龄生育人群提供针对性的备孕与生育优化方案(庞霁芸等,2024)。在女性怀孕阶段,人工智能凭借其巨大的数据存储容量,提供多组学和广泛的基因组数据,排除早产风险,提升生育过程的安全性。针对孕妇分娩前后可能出现的并发症,人工智能通过寻找替代现行筛查的办法,有效预防和控制并发症,提升生育阶段的安全性,减轻孕妇经济压力。对于生育困难的家庭,人工智能可构建体外受精成功率预测模型,在个体化医疗指导下提升青年群体的受孕概率与妊娠质量(刘思甜,2025)。总之,人工智能技术提升了生育全过程的医疗服务质量,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部分家庭因生理性问题或对生育风险担忧而导致的生育意愿下降问题。

另一方面,在当前社会,无人照料子女、精力分配不足和育儿成本高昂等现象,成为抑制年轻家庭生育意愿的重要因素(景鹏等,2023)。人工智能技术在托育服务领域的应用,有效缓解了家庭育儿阶段面临的照护压力与资源瓶颈,为“敢生能养”提供了现实解决路径。人工智能赋能下的托育服务实现了智能化、平台化,降低了育儿机构的运营成本,提升了托育服务的科学有效性。其驱动的儿童监测系统通过数据收集与模拟,建立婴幼儿生长发育知识

库,实现对婴幼儿生长发育的自动评估与判断,针对异常生长指标设定自动预警,并综合各项指标自动生成个体化报告与指导意见(刘宁等,2023),提升了托育过程的安全性与透明度。智能检测设备的应用使先进机器替代了繁重人力,缓解了托育机构对托育服务从业者的过度需求,降低了人力资源成本投入。在幼儿教育领域,智能化育儿软件能基于儿童成长阶段与家庭需求自动推送个性化托育资源、早教课程及育儿建议(黄匡时,2020),完善了机构与家庭协作育儿机制,减轻了家长压力。此外,我国当前婴幼儿实际入托率仅为7.86%,且存在供给结构错配情况(万丹、周文雯,2025)。政府可通过建立人工智能管理平台,对地区幼儿数量与分布进行动态监测,为托育机构建设规划和资源配置提供决策依据,提升公共资源投入的精准性与高效性。人工智能在托育服务中的应用,为托育资源不足和服务水平差距问题提供了技术性解决思路,是我国建立高效、智能、便民托育体系的重要一环,显著提升了适育家庭的育儿信心,进一步增强了育龄家庭的生育意愿。

(三)人工智能影响下的生育意愿抑制作用分析

1. 人工智能下的个体环境变化

(1) 就业岗位“技术性替代”导致生育意愿变化

在人工智能迅速发展的背景下,智能算法与自动化系统在社会劳动领域的大规模应用,对我国现有职业体系造成了一定冲击,推动中国劳动力市场经历前所未有的结构性转型。许多劳动岗位面临“技术性替代风险”,且呈现高、中风险职业增多,低风险职业减少的不良趋势(宋一森等,2025)。就业岗位的减少引发了劳动力需求的降低,使当代年轻人面临的就业环境日益严峻。

对部分初入职场的青年群体而言,他们尚未具备稳固的经济基础,工作收入往往是其主要甚至唯一的经济来源。当面临“技术替代”引发的失业危机时,他们普遍缺乏足够的缓冲与应对能力,抗风险能力较弱。而且,青年群体正处于技能积累初期,职业适应能力尚未成熟(王晶,2025)。在传统岗位被人工自动化系统替代的过程中,他们面临着更为严峻的岗位竞争压力,失业风险进一步放大。为了降低自身被淘汰的风险,大量青年不得不将绝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职场技能提升与工作产出维系中,以适应人工智能时

代的岗位需求(郭凯明,2019)。长此以往,年轻人用于建立亲密关系、维系情感联结和筹划家庭的时间与精力被大幅压缩,婚恋行为在青年群体生活中逐渐边缘化。这种时间与精力的过度侵占,不仅导致晚婚晚育现象普遍出现,还在一定程度上使年轻群体在心理层面弱化了对婚育责任关系的认同,婚育议题逐渐从青年群体的生活规划中退出。当年轻人面临“立业”与“成家”的两难选择时,“成家”往往被置于次要地位,原本的婚育计划被搁置甚至取代,这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他们的生育可能。

已经结婚的年轻家庭同样面临着因技术替代危机产生的失业困境。就业环境恶化引发的生育焦虑并未因婚姻关系而实质性消退,这也加剧了第二次人口转变下家庭中心从“以子女为中心”到“以夫妻为中心”的转变。经济压力与“技术替代”带来的不确定性,促使他们主动推迟生育,以避免因生育中断职业发展节奏,增加重返职场的难度,进而加重夫妻双方的经济负担。在他们的潜意识里,生育愈发成为一种潜在的职场风险,不仅可能导致岗位流失,还可能加剧“职场边缘化”,损害长期职业发展前景。更为严重的是,在强调工作效率量化的现代职场环境中,用人单位对员工产出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提出了更高要求,新婚未育女性极易被贴上“不稳定”“不可控”的隐形标签,其在职场中的竞争地位进一步被削弱。生育带来的经济负担、时间成本和职业机会损失被越来越多家庭理性地放大,最终导致生育的延迟与放弃成为大多数年轻家庭的无奈选择。由此可见,人工智能对年轻家庭就业稳定性的冲击,极大程度地抑制了他们的生育意愿。

(2) 收入差距的加大导致生育意愿下降

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与智能经济的全面兴起,促使社会生产力实现了前所未有的跃升。先进技术逐步取代传统劳动力,成为生产过程中的核心要素,技术要素在价值创造中的比重显著上升。随着人工智能与自动化系统的广泛部署,生产效率得到了大幅提升,同时也加速了资本收益的集中化趋势,使得生产要素收益分配格局进一步向资本倾斜。资本所有者通过持续投资人工智能设备和自动化系统,能够在边际成本递减的条件下获得指数级的回报增长(曹信邦、刘潘婷,2025)。

资本与技术的深度融合,使得财富日益集中于掌握技术和资本的上层精

英阶层,逐步形成了以技术资本为主导的社会生产逻辑。在这种新型生产逻辑下,普通劳动者处于显著的不利地位,其议价能力和待遇水平大幅下降,进而导致社会各阶层之间的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与此同时,人工智能通过“技术性歧视”使劳动力市场呈现出“就业极化”的趋势(陈斌开、徐翔,2024)。那些能够适应高技能要求、拥有创新能力的劳动者将获得更多的高薪岗位和职业机会,而技术能力相对较低的劳动者则面临收入下降与财富缩水的困境。原本维系社会稳定的中产阶层逐渐萎缩,社会就业流动呈现出愈加明显的“上下分化”趋势,最终演变为更深层次的“收入极化”。“收入极化”现象使得社会贫富差距逐渐扩大,部分低收入家庭面临较高的生活成本压力,家庭经济负担加重使适龄群体在就业与生育之间面临更加尖锐的成本权衡与决策困境(王志华等,2024)。根据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发布的数据,与无孩家庭相比,一孩家庭总支出增加 71.27%,二孩家庭总支出增加 160.74%,平均每多生育一个孩子,家庭总支出将提升七到八成(田宏杰等,2022)。高昂的住房、教育与医疗成本加剧了中低收入家庭的焦虑感。在生育带来的“效益”并未明显提升的前提下,面对“成本”不断攀升的社会压力,越来越多的家庭将不生育视为当下的“理性”选择。

2. 人工智能背景下的生育观念转变

(1) 算法引导下的个人价值观“异化”

在人工智能主导的信息传播结构中,当代青年逐步演化为“算法一代”(刘海生、潘建红,2022)。在高度数字化、网络化的社会环境中,信息交流越来越多地被平台算法驱动的个性化推荐所主导,青年的信息获取、价值建构和文化认同也深受算法机制的影响与塑造。这种被接收信息的方式正在悄然改变青年对婚姻和生育的看法,并对他们的未来选择产生深刻影响。

人工智能推送机制在社交媒体、视频软件以及短视频平台得到广泛应用,网络信息分发权正逐步向由流量逻辑驱动的商业化算法体系转移。在这一进程中,平台为提升信息获取效率,更倾向于依据用户的点击率、停留时长和情绪反应等行为数据来选择推送内容(张林,2023)。然而,从传播内容方面分析,由于算法推荐缺乏传统信息监管,用户所处的信息生态呈现出模式化、碎片化和娱乐化特征。这不仅侵占了主流文化价值的传播渠道,还使得

主流婚育观念在网络主导的社会文化传播中逐渐被边缘化。享乐主义、消费主义与精致个人主义等思潮借助算法传播迅速扩散(张特、闫方洁,2022)。对缺乏社会经验和价值判断体系的年轻群体而言,极易形成以个人自由与及时满足为核心的价值观,削弱了他们对社会责任与家庭责任的认同。这加剧了第二次人口转变中强烈个体意识对婚姻制度的冲击,引发青年对婚姻和生育的抗拒心理。他们会将家庭责任视为对个人自由的限制,这种价值理念的转变会从深层次瓦解青年对婚育观念的文化认同。同时,算法主导的信息推送使青年群体陷入“信息茧房”效应。这不仅限制了他们的认知边界,也削弱了社会主流价值观对他们的正向引导作用。一旦算法平台缺乏对传播内容的价值审核,就可能导致青年群体的价值观出现偏移。异化后的价值观在“信息茧房”的影响下逐渐固化,最终致使青年群体对婚育观念产生过度的误读与抗拒,造成严重的生育认同危机。

(2) 女性社会地位提升下的“家庭边缘化”

人工智能技术在社会生产中独具特色,它不仅能替代人类承担生产中的体力性任务,还可凭借分析智能和直觉智能,逐步取代人类从事智力性工作(酈全民,2025)。不过,人工智能对于涉及社会互动的非常规任务,仍难以替代(许清清、李晓雨,2025)。这引发了劳动者在社会生产中职能的变化,即人类正从生产劳动逐渐转向以团队构建和情感沟通为核心的管理领域。

人工智能技术在社会生产中的广泛应用,带来了一系列影响女性发展的新趋势。在这一趋势下,女性能够凭借在沟通能力、情绪调节和团队协作等方面的相对优势,逐步提升自身在就业市场的竞争地位。具体而言,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显著增加了女性的就业机会,提升了女性在经济活动和社会结构中的影响力,促使更多女性劳动者在多元化的劳动领域展现出自主性和竞争力(牛建国等,2024)。随着女性就业情况的改善,相较于传统社会中女性对男性经济支持的高度依赖,婚姻已不再是当代女性获取经济保障的主要途径。越来越多的女性开始主动追求经济独立,试图通过职业成就获得社会认可,以实现自我价值。在这一趋势的影响下,大量年轻女性逐步形成以个人成就为核心的价值观,她们将职业发展和个人实现视为首要任务,通过追求精英化、独立化的生活方式来实现自我价值认同,选择性地淡化婚姻和家庭

在自我价值中的重要性。然而,这种价值观倾向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但如果在缺乏价值中介、公共讨论和理性引导的情况下,同样存在易被片面化或极端化解读的风险。部分较为激进的观点将婚姻视为限制女性自由的制度性约束,将生育描述为对自我价值和职业发展的牺牲,认为婚育是一种落后且缺乏理性支持的选择。在网络传播的影响下,这类观点被逐渐放大与强化,逐步削弱了青年女性对婚育制度的情感认同与价值共鸣,使家庭概念在极端舆论的持续作用下逐渐被边缘化。

3. 人工智能背景下的社会服务偏移

(1) 情感式人工智能服务对婚恋的消极影响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持续发展和广泛应用,智能化的社会服务模式日益多样化。当前,情感陪伴类人工智能产品在技术驱动下快速涌现,成为年轻群体应对婚恋焦虑与情感孤独的工具性选择。在婚恋成本上升、现实情感建立困难的困境下,情感陪伴类人工智能产品为他们提供了一种低风险、低投入的婚恋替代(杨钊、仲佳,2025)。情感式人工智能服务不仅可以提供高度可定制的个性化情感响应,还能在动态的交互模式中实现精准的情感需求匹配。借助情绪模拟算法展现出的各种“类人反应”,能够满足单身青年对归属感和情感联结的交际渴望(秦艺轩、吕笛,2025),为处于数字化社会“群体性孤独”状态的青年群体提供一种“避世式”的情感代偿服务。

然而,“AI 伴侣”在带来便利性与即时满足的同时,也潜藏着深刻的消极影响和伦理隐患。从情感体验层面来看,这种人工智能通过对情感体验进行标准化、量化分析,把复杂而丰富的亲密情感简化为一套可预测、可操控的交互模式,弱化了现实中情感互动所具有的真实性与深度性。青年用户在反复接触这种由算法主导、高度迎合且无条件肯定的情感反馈过程中,会产生严重的情感依赖(翁智刚等,2025)。这种依赖,使他们逐渐形成对现实亲密关系的“过度期望”。这种过度理想化的交往方式,极大地降低了青年人对人际摩擦与冲突的容忍度,导致他们在现实中对伴侣的要求变得挑剔和苛刻(贾梦真等,2024)。从能力发展角度而言,在算法营造的理想化情景中,青年群体的情绪感知能力、冲突承受能力和心理调节能力被不断削弱,降低了他们在现实婚恋中建立亲密关系与相互信任的可能性。从情感观念和婚恋伦

理方面来讲,“AI 伴侣”所带来的情感替代,在侵害青年用户群体的社会情感识别和共情能力的过程中,还潜移默化地改变了他们对婚恋关系的正确认识。在他们的观念里,伴侣不再是需要相互理解、互相支持的人格主体,而是单纯的情感需求供给者。长此以往,部分青年的情感观和婚恋观将逐渐发生异化。婚姻逐步从一种基于责任、信任和互惠的长期承诺,退化为与算法合作生产的即时消费品。这种对于婚恋伦理的异化,将严重影响年轻人主动建立长期稳定婚恋关系的可能性。

(2) 人工智能背景下的生育服务公平性缺陷

人工智能技术逐步融入社会生育服务体系,使社会生育服务在效率提升和质量优化方面成效显著。然而,这种技术驱动下的服务提升也不可避免地暴露出新的社会公平性问题。特别是在生育服务的可及性和普惠性层面,相关问题愈加突出。

当前,我国生育服务领域的人工智能应用尚处于起步阶段,存在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对生育服务的公平性和年轻家庭的生育意愿产生了负面影响。首先,不同地区在智能设施建设和技术普及率方面存在明显的区域性差异。部分发达地区凭借良好的经济基础和完善的技术条件,能够率先实现高质量智能生育服务布局;而一些偏远或欠发达地区由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落后、网络覆盖不足以及技术人员短缺等原因,在数字接入能力和服务可及性方面存在明显劣势,难以及时享受到人工智能带来的生育服务红利(张浩森、姚明霄,2025)。这种服务供给上的区域性差距,造成了不同地区年轻家庭在智能生育服务获取上的机会不平等。其次,当前人工智能所提供的高质量生育服务往往需要较高的使用成本,包括购置智能硬件、支付平台使用费用等,这使得中低收入群体在享受智能生育服务时面临着较大的经济门槛。这种“高门槛”特征使经济条件相对有限的家庭被排除在智能化服务体系受众群体之外,优质服务资源不断向高收入人群集聚,也在无形中剥夺了大部分育龄人群享受智能生育服务的权利。此外,部分智能生育服务设备存在技能和操作门槛,一些受教育水平较低的家庭技术接受能力较弱,在使用这些设备时往往会产生操作上的困难和压力。当他们意识到自己无法像他人一样便捷地享受人工智能带来的科技成果时,容易产生失落与不满情绪,

科技进步带来的剥离感会使其被迫降低生育积极性。从整体来看,人工智能在生育服务领域仍存在基础设施建设不均、服务普及性不足、使用门槛较高等问题。这些问题使得部分智能生育服务在不同人群中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数字鸿沟”(李立清、栾文婷,2025),导致人工智能生育服务难以实现公平覆盖,对生育服务所追求的普惠性与公平性原则构成了一定挑战。尤其是在婚育成本持续上升的背景下,这种服务供给的不平衡在某种程度上抑制了年轻家庭的生育意愿。

三、对现有生育支持体系的审视

现有生育支持体系作为提升生育意愿的有效手段,强调通过时间支持、经济支持、服务支持和环境支持等多维度措施,为家庭提供全方位的政策保障(史毅、韩润霖,2023)。为达成这一目标,国家积极行动,在多个领域陆续出台一系列政策,以加快积极生育支持措施的建立与完善。2022年8月,国家卫生健康委等17部门印发《关于进一步完善和落实积极生育支持措施的指导意见》(简称《指导意见》)。该《指导意见》聚焦完善生育休假、强化经济补助、加强社会资源供给、构建生育友好就业环境等四个方面持续发力,为加快建立积极生育支持政策体系、推动实现适度生育水平、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各级政府依据国家《指导意见》的相关精神,积极制定并落实相应配套政策,从多个维度着力建立和完善积极生育支持措施。在“经济支持”层面,各省市陆续出台育儿津贴发放政策,还通过购房补贴、公租房优先权、减免相关税费、保教入托优惠等多元化支持措施,从物质层面降低家庭生育与养育成本;在“时间支持”方面,地方政府通过延长产假,设立婚假、陪产假及父母育儿假等方式,保障家庭拥有充足的育儿时间,提升家庭在幼儿养育过程中的照护能力;在“服务支持”领域,国家将婴幼儿托位数纳入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指标体系,优化普惠性托育服务的空间分布结构,提升社会公共服务在幼儿照料中的参与力度(原新,2024)。这些生育支持政策通过多项并举的方

式,有效缓解了家庭的生育压力,增强了育龄群体的生育信心。

尽管当前绝大多数支持政策在缓解家庭生育压力、提振生育意愿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在应对人工智能发展引发的深层次社会变革以及生育意愿问题时,仍存在一定的有效性不足。首先,从“经济支持”政策来看,以生育补贴为例,现有的“经济支持”政策着重通过为育儿家庭提供各类补贴,来降低家庭的育儿成本支出,这确实体现了政策在提升生育意愿上的积极意义。然而,单纯的家庭经济供给无法改变家庭成员因“就业替代”而导致收入下降的现状。而且,失业风险带来的经济压力并不会因补贴发放而消除,经济压力导致的生育意愿下降难以通过简单的经济补贴得到根本改善。其次,在文化价值层面,国家为倡导家庭价值和鼓励生育付出了诸多努力。但在人工智能主导的信息传播环境中,主流生育文化传播面临着享乐主义、自由主义等价值观泛滥的威胁。算法推荐机制下的异化价值传播,不断削弱着青年群体对婚育的认同感。

结合人工智能对生育意愿的影响分析,不难发现现有支持政策未能有效解决一系列导致生育意愿下降的社会性问题,如技术替代导致生育时间不足、收入差距致使生育成本攀升、算法引导和女性地位提升造成家庭概念弱化、社会公平引发社会服务偏移等。为此,本文认为,在人工智能深度发展的背景下,应通过政策引导与技术优化,对生育支持体系进行系统性优化(图2),从而提升生育意愿,促进生育行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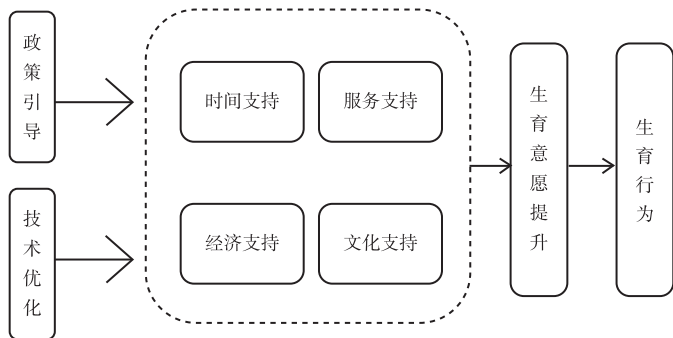


图3 人工智能社会背景下的生育支持优化路径

四、人工智能社会的生育支持体系优化路径

(一)完善职业保障体系以提升生育支持的稳定性

1. 加强职业培训,推动“职业替代”向“人机协调”转化

人工智能的发展在提升生产效率的同时,带来了显著的“替代效应”。不过,这种“职业替代”趋势并非不可逆转。我们可通过制度设计与政策安排,将“被动应对”转变为“主动适应”,从而实现从“技术性替代”到“人机协作”的转型。国家应着力构建面向未来的职业培训体系,推动劳动者技能结构的动态升级。具体而言,要指导企业、高校和职业机构,构建多层次、常态化的免费培训平台,聚焦数据分析、智能系统操作等 AI 适应型技能的普及与培训,以此提升人力资本与智能机器的兼容与协调。尤其要关注育龄阶段劳动者的培训机会保障,明确提出“生育友好”导向。在课程内容、时间安排和经济补贴等方面给予政策性倾斜,降低他们在职业培训过程中的经济压力和心理负担。通过制度性赋能与个体能力建设双重路径,引导“职业替代”向“人机协调”转化。这不仅能有效缓解就业岗位的结构紧张问题,也为构建适应智能社会的生育支持体系奠定了坚实基础。

2. 优化人工智能平台机制,推动弹性工时制度落地

在人工智能深度介入劳动过程的背景下,优化平台型就业机制与推动弹性工时制度的落地,是构建生育友好型就业环境的重要突破口。相关部门应加快建立覆盖平台劳动者的标准化劳动保障体系,明确其劳动者权益的法律认定,并就工作时间、休假安排、生育津贴以及社会保险参保路径等关键权益做出制度保障。同时,要高度警惕人工智能管理平台在任务分配过程中产生的“隐性劳动延伸”问题,防止人工智能平台模糊工作与休息的界限,进而导致劳动时间碎片化与延长化,加剧劳动者面临的“工作—家庭”平衡冲突。劳动部门应鼓励企业在人工智能辅助管理系统的基础上,推动“智能排班+弹性工时”组织形态的常态化运行。借助人工智能对员工偏好、任务性质和时间效率等多维数据进行整合分析,优化任务调度模式,实现工作安排与员工个体节奏的精准匹配,为家庭育儿时间提供有效支持,进而提升青年劳动者

的生育意愿。

3. 完善社会分配体系,缩小社会收入差距

在当前社会生产中,由人工智能技术与资本主导的模式致使收入差距问题愈发严重,优质社会资源正逐渐向少数高收入群体集中。社会收入分配的不均衡,让年轻家庭面临的生育、养育和教育成本大幅提升,进而抑制了家庭的生育意愿。为缓解这一结构性问题,政府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首先,积极推进税制结构的优化调整。适度降低劳动所得税比重,通过提高技术资本收益税率、积极调整现有税收制度税目、探索开征机器人税等举措,平衡不同劳动群体间的收入差距。其次,进一步强化公共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将税收所得精准用于受人工智能技术冲击而收入减少的劳动者群体,强化部分困难群体的基本经济保障,提升其生育成本的支付能力。最后,持续加大在教育、医疗、就业、住房等公共服务领域的资源投入。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与普惠化,切实降低年轻家庭在生育、抚育和教育等方面的经济支出,改善家庭生存环境,促进生育意愿回升。

(二)健全社会服务体系,提升生育支持的公平性

1. 生育支持服务的公平性

在人工智能技术广泛融入生育服务的背景下,科技发展带来的社会服务公平性问题日益凸显,加剧了不同群体之间在生育支持获得上的不平等。针对这一情况,国家可采取以下措施:一是加大对贫困地区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强化落后地区的公共服务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推进人工智能“技术下沉”,让不同区域家庭能够平等享有高质量生育服务;二是针对经济困难群体制定更为多元的资金补贴政策,在智能设备购置补贴和平台服务费用减免等方面持续努力,避免部分人群因经济原因被排除在智能化服务体系之外;三是在降低人工智能服务使用门槛方面,持续优化产品的人性化设计,提升操作便捷性;四是积极鼓励并大力开展数字化培训,帮助部分困难群体提升智能操作技能和网络知识,减轻“数字排斥”带来的心理压力和使用障碍。通过政策与服务的协同优化,在技术赋能的生育服务体系中实现公平性与普惠性的有机统一,切实增强不同群体在智能生育服务中的社会获得感。

2. 加强政策引导,规范人工智能技术服务方向

智能辅助生殖技术与智能托育系统在生育服务领域的应用,为当代适龄生育家庭提供了更为多元的生育支持服务,有效提振了生育意愿。然而,以情感陪伴类人工智能产品为代表的人工智能服务,也在潜移默化中改变了部分青年人群的婚姻和生育观念,引发了青年人两性关系观念的异化。

针对这一情况,国家需加强政策引导与制度建设,明确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边界、规范及价值导向,加快完善人工智能领域的法律法规和伦理规范。要围绕算法推荐、数据采集与智能交互等关键环节,制定清晰的行为准则和责任约束,防止数据滥用与算法操控对用户心理造成过度干预。相关部门应建立人工智能服务的分类管理体系,健全以政府、社会、行业协会为主体的多元服务监管机制。对部分人工智能产品实行适龄提示、使用时限管理和风险教育,引导青年理性看待人机关系,避免对现实婚育关系产生替代和依赖。通过政策引导与制度治理,在发挥人工智能积极作用的同时,防范其对婚育文化、家庭结构及生育意愿的潜在冲击,为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营造更为健康的社会服务环境。

(三)完善生育文化传播体系,树立积极婚育文化环境

1. 加强技术监管,树立正确婚恋价值观

在人工智能主导的信息传播中,算法推荐机制已成为影响青年婚育价值观的重要因素。为有效遏制“去婚育化”倾向,营造积极、健康的婚恋文化氛围,亟须加强技术监管与制度建设,重塑以正确价值观为导向的算法推荐体系。

具体而言,在调整算法推荐技术的主导结构时,应强化政府在平台内容分发机制中的主导地位,确保算法优化服务于国家人口发展战略与主流价值观的塑造。明确技术不应仅服务于商业利益和资本逻辑,更应服从于公共利益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目标这一根本理念。推动“算法推荐+人工审查”的双重治理机制,构建以价值引导为核心的推荐内容评估体系。通过人工干预加强对平台内容的事前审查与事后反馈,纠正算法推荐过程中可能存在的极端个人主义与去家庭主义的传播,加大对正面婚恋、生育、家庭建设

等内容的投放力度,以情景化、生活化、可感知的传播方式,潜移默化地引导青年群体建立积极的情感认同与社会责任感。最后,在技术层面扩展信息筛选维度,破除平台算法形成的“信息茧房”。通过技术手段增加推送内容的多样性与均衡性,拓展用户接触网络信息的广度,从根本上纠正信息供给问题。通过制度监督与技术治理的深度协同,构建兼顾技术效率与价值导向的婚育文化传播体系,为重建青年群体家庭观念、提升生育意愿提供良好的文化土壤。

2. 以传统文化为根基,塑造生育友好型文化氛围

在人工智能深度融入文化传播与社会文化价值体系的大背景下,我们应坚定遵循“以传统生育文化为根基,以人工智能生成技术为手段”这一新时代生育文化宣传路径。此路径意义重大,它不仅是抵御“去婚育化”话语侵蚀的坚固文化屏障,更是构建生育友好型舆论环境的关键资源。中国传统文化蕴含着丰富的婚育价值内核,从中国传统儒家伦理中的“家本位”思想,到现代“代际责任”观念,有着深厚的历史传承。在人工智能时代,如何将传统文化与技术手段深度融合,成为重塑家庭价值与生育认同的核心问题。构建“传统文化+人工智能”的内容共建机制,一方面可以防止传统文化日趋形式化与符号化,另一方面能确保积极的婚育价值理念不被异化,进而在潜移默化中提升青年一代对婚育与家庭责任的文化认同和实践意愿。

五、结 语

在人工智能技术深度重塑社会发展的当下,科技的发展带来了诸多积极影响。它改善了人们的工作模式,提升了生育服务水平与生育文化传播方式,对适龄生育人群的生育意愿有明显的促进作用。然而,我们也不能忽视智能科技带来的负面影响,如生育成本上升、生育价值观异化等现象。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是客观事实,随着其应用范围的不断扩大,必将在社会各个领域产生深远影响。因此,我们需要建立前瞻性、系统性的视角来审视技术进步带来的社会变化。树立并完善“政策引导+技术优化”的生育支持政策

服务体系,已成为人工智能时代缓解低生育困境、实现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重要举措。

参考文献:

- 曹信邦、刘潘婷,2025,《数智时代低技能劳动者收入极化与社会保障调节机制构建》,《南京社会科学》第6期。
- 陈斌开、徐翔,2024,《人工智能与社会公平:国际经验、影响机制与公共政策》,《国际经济评论》第3期。
- 郭凯明,2019,《人工智能发展、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与劳动收入份额变动》,《管理世界》第7期。
- 黄匡时,2020,《人工智能时代人口研究的前瞻性思考》,《人口研究》第3期。
- 贾梦真等,2024,《自主生成式亲密关系:青年与人工智能伴侣的互动体验》,《青年探索》第1期。
- 景鹏等,2023,《生育支持、生育率与经济增长》,《经济科学》第1期。
- 李立清、栾文婷,2025,《生成式人工智能嵌入公共服务治理的作用机理与风险防范》,《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3期。
- 酆全民,2025,《科学哲学的新使命:基于人工智能驱动科学研究的考察》,《哲学研究》第4期。
- 刘翠花、丁述磊,2025,《数字技术、工作变革与家庭平衡》,《经济社会体制比较》第3期。
- 刘海生、潘建红,2022,《智媒时代青年功利主义思想倾向的生成及引导》,《思想教育研究》第6期。
- 刘宁等,2023,《互联网视角下婴幼儿智慧托育服务模式探讨》,《中国医院管理》第5期。
- 刘思甜,2025,《论妇产科领域的认知不正义》,《医学与哲学》第6期。
- 鲁全,2021,《中国的家庭结构变迁与家庭生育支持政策研究》,《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第5期。
- 穆光宗、林进龙,2021,《论生育友好型社会——内生性低生育阶段的风险与治理》,《探索与争鸣》第7期。
- 牛建国等,2024,《数字经济背景下人工智能发展对女性就业影响的研究》,《当代经济管理》第6期。
- 庞霁芸等,2024,《人工智能在精子质量分析与精子优选中的应用》,《四川大学学报(医学版)》第5期。
- 秦艺轩、吕笛,2025,《触不到的AI人:数字时代青年群体的赛博之恋》,《当代传播》第2期。
- 石人炳、王昕迪,2025,《第二次人口转变下中国婚育观念的变迁与新型婚育文化建设》,《青年探索》第2期。
- 石智雷、杨云彦,2014,《符合“单独二胎”政策家庭的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人口研究》第5期。
- 史毅、韩润霖,2023,《生育支持政策体系构建:内涵、价值与路径》,《北京行政学院学报》第6期。
- 宋一森等,2025,《人工智能对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冲击和影响》,《经济学家》第6期。
- 田宏杰等,2022,《三孩政策下的低生育意愿:现实束缚与文化观念制约》,《青年探索》第4期。
- 万丹、周文雯,2025,《我国托育服务供需错配的表现、成因及破解路径》, <https://doi.org/10.13694/j.cnki.ddjylt.20250724.001>。

- 王晶,2025,《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风险与社会政策转型方向》,《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第2期。
- 王志华等,2024,《收入差距与生育意愿:促进还是抑制?》,《人口与发展》第6期。
- 翁智刚等,2025,《面向新型人机关系的社会临场感》,《心理科学进展》第1期。
- 许清清、李晓雨,2025,《人工智能、时间配置与性别收入差距》, <https://link.cnki.net/urlid/62.1019.C.20250509.0727.004>。
- 杨钊、仲佳,2025,《青年群体“AI 伴侣”走热的生成逻辑、伦理风险和引导方向》,《宁夏社会科学》第3期。
- 於嘉、谢宇,2019,《中国的第二次人口转变》,《人口研究》第5期。
- 原新,2024,《科学构建生育支持政策体系》,《人民论坛》第13期。
- 张浩森、姚明霄,2025,《农村生育支持体系建构路径研究——基于社会质量理论视角》,《贵州社会科学》第4期。
- 张林,2023,《分化与平衡:算法推荐场域主导意识形态传播权力建构》,《社会主义研究》第6期。
- 张特、闫方洁,2022,《算法推荐视域下的青年价值观塑造:风险挑战与优化策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第5期。
- 赵伟锋等,2017,《成本收益失衡、学习演化与区域低生育水平强化》,《经济经纬》第5期。
- 赵文政、张立国,2025,《教育政策驱动生育友好型社会建设:运行逻辑、实践困境与关键进路》,《当代教育论坛》第2期。
- 支振锋,2023,《生成式人工智能大模型的信息内容治理》,《政法论坛》第4期。
- 周国红等,2021,《“生育主力”缘何有名无实?——基于743份城市青年生育意愿的问卷调查分析》,《浙江社会科学》第5期。
- Demeny, P. 2003, “Population Policy Dilemmas in Europe at the Dawn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29(1).

责任编辑:赵海峰、杜宇鹏